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與前景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07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77-8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7](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與前景

畢英賢

中共與蘇聯間，關係正常化第二回合磋商於三月一日在莫斯科開始，十五日正式結束。雙方對磋商的過程與結果，皆未作任何說明。因此，若欲以這次磋商的實情為基礎，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步伐與前景進行評估，相當困難。事實上，中共與蘇聯間第二回合的磋商，僅是雙方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標誌，而不是一個決定性里程碑。所以，在檢討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動向時，若從較廣的層面着手，反而較易有所發現。

概括言之，目前正在進行的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始於一九七九年。當年四月三日，中共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第七次會議中通過，「中（共）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予延長。中共同時宣佈，中（共）蘇之間的原則分歧「不應妨礙兩國在和平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正常關係」<sup>①</sup>。所謂關係正常化，雙方一致的界定是：在和平五原則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政府與政府間的正常關係。和平五原則則是：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一九七九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共與蘇聯在莫斯科展開首次關係正常化談判，共舉行了六次全體談判會議。會後，雙方對會談過程與結果皆沉默不言。雙方同意，於一九八〇年二月底三月初在北平舉行第二次談判。一九七九年底，蘇聯以武裝部隊干涉與中國疆土相鄰的阿富汗的內政，並把大量蘇聯軍事力量在阿境留駐。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九日，中共「外交部」宣佈，蘇聯入侵阿富汗威脅了世界和平與中共安全，造成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新障礙，中共並認為「在這種情形下不適宜舉行中（共）蘇談判」，因此予以「中止」<sup>②</sup>。從此，「蘇軍撤離阿富汗」成爲中共與蘇聯「改善關係」的三個先決條件之一。

註① [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九年四月四日。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日。

## 正常化的實質表現

儘管阿富汗事件使中(共)蘇關係正常化談判「中止」(並非終斷)，但是雙方實質關係並未因此僵化與惡化，反而出現改善的新跡象，尤以近兩年為然。

在一九八一年內，有四個蘇聯代表團到中國大陸參加各種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中共也有十七個科學團體訪問蘇聯，參加科學會議。十一月，中共體操隊到達莫斯科參加第二十一屆世界錦標賽<sup>③</sup>。

去(一九八二)年，這類友善活動更加頻繁，茲列舉若干事例以顯示其一般趨向。一九八二年一月，「蘇中(共)友好協會」代理主席、漢學家、蘇聯外交學院院長齊赫文斯基(T. Tikhvinsky)到北平訪問。二月，中共與蘇聯簽訂假道運輸協定，中共可經由蘇聯領土與歐洲間運輸貨物；三名中共經濟專家訪問蘇聯。三月，中共體操隊赴蘇聯參加「莫斯科新聞杯」國際體操賽及國際體操邀請賽。四月，雙方在北平簽署中(共)蘇換貨協定，年度貿易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五月，蘇聯的中國問題專家、蘇聯外交部遠東第一司司長卡匹查(M. Kapitsa)訪問北平；中共貿易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中共經濟學家及蘇聯問題專家舉行研討會，討論「蘇聯及東歐集團政治與經濟的改革」，與會者多數贊成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反對南斯拉夫模式。六月，蘇聯田徑賽明星選手參加北平的「中(共)蘇運動會」。七月，「北京週報」表示，中共有意與蘇聯改善關係；簽訂「中(共)蘇邊界的鐵路交通的議定書」。八月，中共「外交部」蘇歐司司長于洪亮訪問莫斯科。九月，中(共)蘇簽訂「圖書出版物互相交換協定」；「蘇中(共)友好協會」於莫斯科為中共政權三十三週年舉行慶祝會。十月，蘇聯副外長伊里切夫(I. Iliev)赴北平與中共進行磋商以圖改善雙方關係。十一月，布里茲涅夫去世，中共「外長」赴莫斯科弔喪，會見蘇共新領袖安德洛波夫，並與蘇外長晤談。十二月，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兼工業食品局長率團訪問北平兩週；莫斯科芭蕾舞團抵北平作為期一週之訪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六十週年，中共去電祝賀，「誠心希望」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黃華出席蘇聯駐北平使館慶祝酒會。一九八三年元月，中共英文「中國日報」表示，蘇聯和東歐的設備最適合中共工業水平；趙紫陽表示中共願意實現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二月，蘇聯駐北平使館舉行建軍節招待會，中共高級官員應邀出席；蘇聯高級政論家鮑文(A. Bovin)訪問北平；胡耀邦表示，不贊成中(共)蘇積怨很深一下子難以消除的看法；中共代表團抵蘇舉行第二回磋商。

以上這些已為世人所知的事實，在六十年代中、後期及七十年代內是罕見的，而在近年內卻連續出現，決非偶然。顯而易見，一九七九年底，中(共)蘇在談判中可能已達成若干諒解與協議；這也許就是中共對蘇聯入侵阿富汗之舉，在二十多天後才遲

註③ 烏克藍柴夫(M. S. Ukrainsev)、「蘇中(共)關係：問題與展望」，[遠東問題]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

遲反應的主要原因之一。前述的那些「友好」活動可能都是預先安排的。這樣做的目的也許在緩和雙方多年來所積累的敵對情緒與氣氛，先排除正常化的心理障礙。

## 蘇聯對正常化的態度

總的說來，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於六十年代內開始惡化，一九六九年因邊界武裝衝突而達於頂點。當年九月十一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 (A. N. Kosygin) 與中共周恩來在北平飛機場合談，曾使情況轉趨穩定，十月二十日雙方遂開始了副外長級邊界問題談判。然而多次會談皆未產生明顯結果，故自一九七八年之後，至今未曾舉行過。

在使中(共)蘇關係步入常軌、使雙方進行接觸與對話諸方面，蘇聯始終採取主動與大步政策。但是，中共方面似乎一直處於被動；近年來則採取小步政策，作小幅度的反應。七十年代內，蘇聯曾對中共作過多次改善彼此關係的建議，中共不是置之不理，就是要蘇聯作出實際表現。

進入八十年代後，蘇聯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方面更加積極推動。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蘇聯共黨在其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表示，蘇聯從不欲與中共對抗，而願在睦鄰的基礎上建立關係<sup>④</sup>。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向中共「外交部」提交一項建議，希望共同討論如何在遠東地區實行增進相互信任的措施，以便降低該地區的緊張情勢、鞏固和平。對此，中共亦未正式作答，但在報刊上說，既有人造衛星的監視，這類措施沒有用處<sup>⑤</sup>。

同年九月二十五日，蘇聯外交部向中共駐蘇聯「大使館」送達一份照會，建議擇期繼續舉行邊界談判，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答覆蘇聯說，此一談判確有恢復的必要，但是由於雙方必須預先作好基本準備，故建議無限期延緩。十二月十六日，蘇聯外交部向中共駐莫斯科「大使」建議，恢復雙方的科學技術合作，首先在對等的基礎上交換一兩個專家訪問團，相互了解彼此在某一生產部門的科技成就。如果北平方面想要就某一部門或某一問題交換經驗與心得，莫斯科方面將予以考慮。中共對於這個建議未曾直接答覆。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蘇聯高等與中等專科教育部表示，預備同中共交換學生與教師，每年每方十人<sup>⑥</sup>。據報導，中共正準備派遣一批學生赴蘇聯留學<sup>⑦</sup>。

註④ 《蘇聯共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會資料》(莫斯科，一九八二)，第十一頁。

註⑤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

註⑥ 烏克藍柴夫，「蘇中(共)關係」，《遠東問題》，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二十二頁。

註⑦ 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



蘇共前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八二年三月在烏茲別克共和國首都塔什干發表演講時，特別強調蘇聯欲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意願，並就此一問題提出了四點基本立場：(一)儘管蘇聯公開批評中共領導的政策特別是其對外政策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與規範，但是蘇聯從未干涉中共內部事務。蘇聯從前沒有否認、將來也不否認在中國大陸上「存在着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二)蘇聯始終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所謂「兩個中國」的概念。(三)蘇聯從前沒有、將來也不會對中共有威脅，蘇聯對中共沒有領土要求，並準備隨時就現有邊界問題繼續談判，以便達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蘇聯也準備討論關於加強邊界地區相互信任的可能措施。(四)蘇聯從來沒有認為兩國之間的敵對與疏遠狀態是正常現象。蘇聯準備無任何先決條件地與中共舉行談判，以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措施，在相互尊重對方利益、不干涉對方內政、互惠與不損及第三國的基礎上改善蘇聯與中共關係，包括經濟、科學、文化及政治關係<sup>⑥</sup>。

毫無疑問，布里茲涅夫這段聲明在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具有重大意義，也可以說是蘇聯在中(共)蘇問題上所持基本立場的總表白。值得重視的是，蘇共首先向中共認同，表明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然後保證，蘇聯對中共沒有「威脅」。在這篇講詞發表後，蘇聯對中共問題有關的言論開始以這段談話為軸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蘇共機關報題為「論中(共)蘇關係」的文章，作者署名亞歷山大洛夫(I. Aleksandrov)。據說，這個名字乃是蘇共黨機關的代號。這篇文章對布里茲涅夫的談話詳加闡述，並強調，中(共)蘇關係的改善不僅有區域性意義，而且有世界性意義<sup>⑦</sup>。同年九月，布里茲涅夫在阿塞拜疆共和國首都巴庫說，他認為蘇聯與中共在「理智、相互尊重及互惠的基礎上」逐漸改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事<sup>⑧</sup>。

### 中共的反應與做法

從蘇共的言論與做法看，蘇聯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態度是主動和積極的；相反的，中共卻採取了小步政策，對蘇聯的倡議作有限的、有條件的反應，或置之不理。事實上，二十多年來的惡言相向、互為仇敵，在雙方社會中業已造成一定程度的相互抗拒心理，非短期內可以突然轉變。這也許是中共採取小步政策的基本原因之一。其次，中共內部對正常化的意見尚未統一。易言之，反對正常化的勢力雖在退化中，但一時尚難完全消失，使得主持正常化政策的人難以放手施為。最後，中共對蘇聯當局所言猶抱懷疑態度，故屢次要求蘇聯當局以實際行為來證明其願意正常化的誠心。

註⑧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註⑨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日。

註⑩ (消息報)，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可以確信，在中共領導階層中，主張同蘇聯和解的人逐漸增多。若干中共領導人物似乎已領悟到，在國際交往中一味反蘇並非上上之策。他們認為，改善中（共）蘇關係可使中共在國際舞臺上有較大的運用自由。中共越來越清楚地看出，即使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與蘇聯打交道、做買賣、進行經濟與科技交流與文化接觸<sup>⑮</sup>。

在這種既欲正常化，又擔心不利因素的情形下，中共於是採取「小步政策」。首先，中共在蘇聯各地廣泛蒐購俄文圖書，至一九八二年初已達五十萬冊；同時，在各大學內恢復俄文系及俄國研究課程；並擴大研究蘇聯的文學、科技成就、經濟經驗等。中共表面上在研究「敵情」，實際上在吸取可加利用的經驗與成就<sup>⑯</sup>。一九八〇年，中共成立了「蘇聯研究所」，隸屬中共「中央」，以便深入研究蘇聯問題。所長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劉克明擔任；劉克明被認為從六十年代中（共）蘇大論戰時起，對中共的對蘇方針與決策有很深的關係，是中共主要的蘇聯問題專家<sup>⑰</sup>。該所成立不久，即首先與日本方面的蘇聯研究人員交換訪問，相互研討<sup>⑱</sup>。

進入八十年代後，中共代表開始出席在蘇聯土地上所舉行的各種國際會議，也讓蘇聯代表進入中國大陸出席國際性會議或比賽。雙方學者、專家、甚至官員開始相互訪問。不過，中共方面的人員係以中共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客人身份在蘇聯境內活動；同樣的，蘇聯方面的人員則以蘇聯駐北平使館的客人身份在中國大陸活動。例如，一九八二年二月間，中共數名專家訪問了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建設委員會、一系列科學研究所、企業、集體農場等。換句話說，他們有機會去了解蘇聯經濟的運作與實況。同樣的，去年底，蘇聯一個經濟代表團到達中國大陸訪問兩週，觀摩養蠶技術和絲織業。這種相互訪問的方式，這種小步伐的正常化，也許是雙方默契或協議的結果。

中共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會中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對蘇聯歷次關於改善關係的建議作出了正式的總答覆。他說：「我們注意到蘇聯領導人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辭而是行動。如果蘇聯當局確有誠意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並採取步驟解除對我國的安全威脅，中蘇兩國關係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sup>⑲</sup>。所謂對中共安全的嚴重威脅，包括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派駐重兵、蘇聯支持越南侵佔高棉、蘇聯武裝佔領阿富汗。這些也就是中共所說的中（共）蘇關係正常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礙。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其「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告，中共今後將「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易言之，在國

註⑮ 烏克蓋柴夫，「蘇中（共）關係」，〈遠東問題〉，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

註⑯ 同註⑮。

註⑰ 〈大公報〉，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六日。

註⑱ 參見，「蘇聯問題」（東京），別冊十八（一九八〇）。

註⑲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際關係中，中共「決不依附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sup>⑭</sup>。在這一新方針下，中共今後在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將採用等距離外交，既不倒向蘇聯，也不與美國搞「平行戰略利益」。這樣一來，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乃是必然的趨向。很自然地，雙方在一九八二年十月舉行了阿富汗事件後的第一次磋商。

## 第一回合磋商的經過

中共與蘇聯在一九八二年十月所舉行的第一回合磋商決非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起點，但具有重大與突破性意義。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里切夫（J. Michay）於十月四日到達北平與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錢其琛進行晤談，二十九日離去。其間，舉行了六次會晤，根據雙方的協議，磋商內容不對外宣佈。據報導，雙方在交談時的氣氛「非常友好」，中共已一改對蘇聯人的敵視態度。同時，從參與磋商的蘇聯人的表情來看，「會談進行順利」<sup>⑮</sup>。

根據判斷與一些間接資料，這次磋商並未在「關係正常化的公式」方面達成決定性協議，頂多只解決了一些程序問題。蘇聯方面曾希望擬訂一個擴展關係的明確方案，並提出了一個日程表。但是，中共方面堅持先討論三個基本問題：蘇聯從中蘇邊界及外蒙撤減駐軍；從阿富汗撤走蘇軍；停止支持越南對高棉的侵略<sup>⑯</sup>。雙方堅持自己立場，拒作重大讓步，但是同意，於一九八三年初在莫斯科舉行第二回合的磋商。

第一回合中（共）蘇副部長級的磋商，其重要性不在於它解決了多少問題、克服了多少歧見、達成了多少協議，而在於雙方表達了接觸、磋商、談判的意願，以及逐漸弱化的敵意氣氛。就實質言之，磋商本身就是一項進展。人們依然記得，一九八〇年初，中共聲言，蘇聯必須先從阿富汗撤兵，雙方才有可能坐下來談判。在此次磋商之前，蘇聯並未履行中共的要求。儘管中共玩弄文字遊戲說什麼「磋商」不是「談判」，顯而易見，中共在這個問題上已作出讓步。

法國共產黨總書記馬歇（G. Marchais）於十月底訪問中國大陸後，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進展作了如下的說明：中（共）蘇關係正在改善；據他了解，中共和蘇聯已經各自提出他們的建議，「存在著改善關係的某些可能性」<sup>⑰</sup>。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答覆法國記者所提出的問題時，表達了中共對這次磋商的看法與對蘇聯所持的基本立場：（一）中共「誠心誠意」希望能排

註⑭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九月八日。

註⑮ 《UPIV北平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註⑯ 《APV北平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註⑰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除一切有害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二)這次所進行的是雙方副外長級的接觸，而非黨的接觸；是磋商，而非會議或談判；(三)中共從不贊成蘇聯所奉行的霸權主義，但對其內部問題，多少年來不發表意見，也不應發表意見<sup>②</sup>。

在蘇聯方面，對這次磋商很少作出評論，不過蘇共「真理報」主編阿伐納西耶夫(V. Afanasyev)在接受美國一家報紙訪問時表示，中(共)蘇關係正常化已有若干小的進展，這是令人鼓舞的。雙方業已打開僵局，但是中共方面尚未採取決定性的步驟，放棄三個先決條件。他說，蘇聯方面並未承認任何先決條件，越南高棉問題不在蘇聯權限之內，至於阿富汗問題，蘇聯早就希望政治解決。他認為，在中共所提出的三個問題中，祇有中蘇邊界駐軍問題是「雙邊問題」，最有解決可能，因為「中共與我國皆不願在邊界上派駐大量軍隊，耗費大量金錢。當然，我國政府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或早或晚，這個問題將獲解決」<sup>②</sup>。

## 第二回合磋商的前後

蘇共前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突然去世，而中(共)蘇關係正常化是他近年來大力推動的政策。因此，他的死會不會影響這個正常化的進展？從安德洛波夫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言與行看，蘇共新領導如果不會加速，至少會維持這個業已開始了的正常化過程。因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蘇聯多年來一貫追求的目標；因為，安德洛波夫上臺後，一再強調蘇聯政策的延續性；因為，多年來中(共)蘇關係改善與否的關鍵大部份繫於中共的立場，而如今中共一再表示「誠心誠意」與蘇聯改善關係的基本方針不會變更，蘇聯當然不會坐失良機。

蘇聯為布里茲涅夫舉行葬禮時，中共「外長」黃華前往參加，在一次招待會上，安德洛波夫「用有力的握手歡迎黃華，並與他交談三分鐘」，是這次宴會上安德洛波夫與外國客人交談最長的一次。次日，黃華與葛羅米柯會見，就改善中(共)蘇關係交換意見。這是二十多年來的首次<sup>②</sup>。一九八二年底，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為慶祝「蘇聯」六十週年在「共產黨人」上發表論文，特別提到對中共的關係。他首先肯定中共是「社會主義國家」，並認為與中共改善關係可強化亞洲與世界和平。蘇聯外長表示，莫斯科將竭盡所能使雙方關係得到有利的發展<sup>②</sup>。安德洛波夫本人也曾在蘇共十一月全會上表達了與此相似的觀點<sup>②</sup>。今年初，中

註②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註③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十三頁。

註④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⑤ 葛羅米柯，「為了地球上的和平」，(共產黨人)(Kommunist)，第十八期(一九八二)，第二十五頁。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共高層領導再次表示，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符合雙方人民的利益；因此，同蘇聯關係恢復正常是中共的「真誠願望」。同時，中共並不認為，中（共）蘇關係積怨很深，難以消除<sup>29</sup>。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蘇第一次磋商後，蘇聯方面的言論甚少批評中共；相反的，中共方面仍不斷出現批評蘇聯政治方針的材料，特別是關於邊界「領土」問題。於是，蘇聯「新時代」週刊的「觀察家」突於今年一月十四日發表了題為「這是爲了什麼」的長篇文章，對中共施以反擊。文章指責中共「歪曲歷史」、「向蘇聯提出領土要求」，並認為中共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留一手」，隨時準備「阻撓」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進程。「觀察家」最後堅持，蘇聯對中共方面帶有成見的描述中俄關係歷史一事不能忽視，因爲「這是原則性問題，必須給予相應答覆與解釋」<sup>30</sup>。對此，中共「世界知識」雜誌也作出了相應的答辯。中共認為，大陸各種書刊論述中俄不平等條約與割讓領土問題是歷史問題，而蘇聯竟把中俄歷史問題與中蘇邊界問題，特別是當前中（共）蘇關係聯繫起來，乃是故意歪曲。同時，中共重新聲明，中共對蘇聯沒有任何領土要求，中共「並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國根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的中國領土，而是主張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爲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兩國的邊界問題」<sup>31</sup>。

客觀言之，值此雙方關係正常化穩步進行之時，雙方各就邊界問題叫罵一陣，各有自己特定的圖謀。在蘇聯方面：（一）維護「領土主權」；（二）減少西方對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畏懼，因而減少正常化的阻力；（三）向中共施加輕微壓力，警告其不得過份囂張，並表示蘇聯的容忍有一定限度。在中共方面：（一）不斷攻擊蘇聯，特別在領土問題上，使蘇聯當權者感到理虧，以便在其他問題上迫其讓步；（二）安撫黨政內一些反蘇分子，表明正常化有限度；（三）令歐、美、日等國安心，使它們相信，中（共）蘇關係正常化不可能達到和好如初的程度，中共也不願如此做；（四）領土問題雖不在中共「三條件」中，但已成爲中（共）蘇關係的控制器，中共可按照自己的意願，配合自己的政策，隨時加以運用與調整。

在中共代表團正準備啓程前往莫斯科參加第二回合磋商之際，蘇聯高級新聞官員鮑文突然到達北平。一般報導皆認爲鮑文與安德洛波夫關係密切，因此他的北平之旅，意義頗不尋常，可能携有安德洛波夫的函件或建議案。建議案可能涉及雙方在邊界地區相互與有限度撤減武裝力量的問題，以及增加邊界貿易，開放邊界牧羊等措施<sup>32</sup>。有人詢問莫斯科官員鮑文是否携有函件時，他回答說：「沒有。但鮑文本身就是尋求改善關係的函件」<sup>33</sup>。

註<sup>29</sup> [大公報]，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sup>30</sup> [觀察家]，「這是爲了什麼」(“Zachem Eto Nyzhno?”)，[新時代] (Novoe Vremya)，第三期(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四日)，第十至十二頁。

註<sup>31</sup> [世界知識] 評論員，「駁斥蘇聯就邊界問題的無端攻擊」，載[大公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第二頁。

註<sup>32</sup> A P V 北平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八日。

註<sup>33</sup>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

中(共)蘇第二回合磋商在莫斯科進行期間內，其實情很少爲外界獲悉，雙方對磋商內容也隻字不談。三月十五日，磋商正式結束；曾傳言將發表簡短公報，但至今尚未出現。因此，對這次磋商的過程、內容及結果，祇能根據稀有資料加以推測。

磋商的主要內容毫無疑問在討論如何消除中(共)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正如蘇聯官員所說，在中共與蘇聯之間存在很多「複雜問題」，當然最主要的是中共所提出的三個條件。目前，雙方已同意逐一解決這些複雜問題<sup>⑳</sup>。但是，問題是，先解決那一個問題。在中共的心目中，高棉問題的解決，佔着最優先的位置<sup>㉑</sup>。蘇聯方面則主張，先解決「純粹的雙邊問題」，也就是討論共同邊界地區的駐軍數量與領土糾紛問題。關於後者，蘇聯方面已不斷作出表白；如果中共真的「真誠願望」與蘇聯恢復正常關係，在這個程序問題上當會作出有條件的讓步。

磋商的結果至今尚無法獲悉，不過據莫斯科方面表示，磋商在「熱烈與友好」的氣氛下進行。有關問題以及中共所提出的條件都已一一觸及，但是並未產生重大政治突破<sup>㉒</sup>。在磋商期間，錢其琛曾與葛羅米柯晤談，討論雙邊關係及若干國際問題。

目前，雙方業已證實，下一回合的磋商將在北平舉行。可以推測，這兩次磋商已使中(共)蘇關係獲得實質的改善。最大的佐證是，中(共)蘇一九八三年的貿易額已較一九八二年增大百分之一百五十，這是多年來罕有的現象。在中共與蘇聯間，貿易額的高低一向是與雙方關係的好壞成正比；因此，可以確定在過去一年內，中(共)蘇關係正常化已有了相當的進展。而今後中(共)蘇的實際交往也可以間接反映出這次磋商的成果。

## 正常化的變數與前瞻

中共與蘇聯經過兩度磋商，雙方關係正常化已奠定了一些基礎，但是未來的發展有賴一系列變數的運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的意願。中共改變態度願與蘇聯修好，內在的原因多於外來的原因，更非因中(共)美關係「黑影」所促成<sup>㉓</sup>，對外政策是國內政策的延續。中共與蘇聯長期處於衝突狀態中，雙方皆曾蒙受不小損失，造成內政與外交上的限制因素。現在，雙方皆需要一個安寧而不需擔心的中蘇邊境，以便全心全力解決其他較迫切的問題。此外，正如日本中共問題專家中嶋嶺雄所說，他們必須團

註<sup>⑳</sup> 同註<sup>⑲</sup>。

註<sup>㉑</sup> 「大公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

註<sup>㉒</sup>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第二頁。

註<sup>㉓</sup> 中共駐日本大使宋之光語，見「大公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結一致應付「社會主義危機」<sup>②</sup>。今後，如同以往一樣，中（共）蘇關係改善的變數與中共有關者多於與蘇聯有關者。茲將可能而較顯著的變數簡述於後。

一、中共的基本政策：目前中共標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這個前提下，中共與蘇聯改善關係，但可以免去北顧之憂，而且可以使部分軍費移作基本建設之用。因此，這個政策如果不變，則有利雙方關係的改善。

二、中共的對外政策：中共業已鄭重宣佈，而且不斷重申，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因此對莫斯科與華盛頓勢將維持等距離外交。這個對外政策方針若不變，則中共與蘇聯關係必然轉趨緩和，但不可能達於親密度。

三、中共的「三條件」：中共曾提出關係正常化三條件，如果蘇聯在這些問題上讓步又大又快，則正常化的進程亦較快；反之，則緩慢而曲折。就三個條件而論，邊界撤兵問題比較容易解決，但要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佔高棉與自阿富汗撤軍則很難，起碼不是近期內可以達成的。不過，如情勢需要，中共可能作出一些讓步。

四、經濟關係：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式分裂始於一九六〇年蘇聯撤回協助中共建設的蘇聯專家，撕毀合同，停止正在建設中的工程項目。目前，中國大陸大部分人員仍習慣於偏愛蘇聯的設備與技術。在這方面，蘇聯若予放寬，則雙方關係改善步伐將加快。

五、雙方領導階層的態度：目前雙方領導皆一再表示有意於關係正常化，但進一步進展有賴於雙方決策者的政策導向。然而，雙方領導階層因長期衝突所形成的懷疑心態非一朝一夕可以克服；因此，雙方領導很難坦誠放手施為。

六、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分歧，原是中共與蘇共分裂的起因，目前意識形態雖然已經不是阻礙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因素，但是雙方關係若欲進一步改善，則有待意識形態差異的折衷。這一點很難在短期內做到，所以目前雙方對這個問題皆避而不提。

七、國際環境：國際間重大的事件或第三國的特殊作為或不作為亦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正常化。例如，美蘇關係的緩和則有利於中（共）蘇關係的正常化。

以前述變數為基礎，考量中共與蘇聯實質關係的漸變，衡量當前的客觀形勢，可以假定，中共與蘇聯正常化的可能發展方向是：

- 一、中共與蘇聯關係將繼續改善，但速度緩慢。
- 二、雙方關係將從有控制的衝突轉向有限度的和解。

註②

〔日本時報〕（英文），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三、雙方將進一步改善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邊界緊張進一步緩和；擴大經濟關係；加強文化、科技等交流。但是，在對外政策上，在若干國際問題上，雙方仍將保持一定程度的歧見。

四、政治關係改善後，黨與黨的關係不是不可能恢復，但是恢復之期不會很早。

五、在「磋商」達到一定程度的成就時，談判將會升級；當談判達到一定程度的協議時，雙方可能共同擬訂一個新的關係架構。屆時，中（共）蘇關係將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

本書第一、二、三冊，按時序先後編纂，紀述共黨自建黨至抗戰勝利之禍國罪行。第四冊起，改按專題編纂為「農村變亂（一）—查田運動」，第五冊為「農村變亂（二）—蘇維埃暴力分地」，第六冊為「農村變亂（三）—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與武裝叛亂時期的清算鬭爭等」。

十六開本

六巨冊

工本費 新臺幣 一千六百八十元  
美金 四十七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臺幣四十二元  
國外：平寄美金 十五元  
航空美金 六十五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限閱資料憑機關學校公函購用。